

后金融危机时代欧洲政党政治结构的变迁

——以“经济投票”为研究视角*

余南平

内容提要:本文以国际金融危机中欧洲政党政治结构变迁为背景,以“经济投票”理论为解释工具,全面梳理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欧洲政党政治的变化。文章运用实证和对比方法,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欧洲中左与中右政党力量变化的内在原因,解释了后危机时代欧洲政党与政治的某些关键性变化,提出了欧洲政党政治面临的挑战与结构性问题。

关键词:欧洲 政党政治 结构变迁 国际金融危机

引言

早在2008年,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学研究刊物《西欧政治》以纪念创刊30周年特刊的形式,邀请了欧洲17位有影响力的学者,对过去30年欧洲政党政治和社会的结构变迁进行了系统总结与分析,内容涉及欧洲一体化、欧盟、民族国家、地方治理、欧洲政党政治竞争、福利国家、公共政策改革等问题,其研究视角涵盖了概念、理论与实践,包括研究方法的创新。其中令人印象深刻并与今天形成现实对照的是,意大利米兰大学教授费雷拉(Maurizio Ferrera)当时对于欧洲福利国家“黄金般成就与白银般前景”的结论性判断。^①那时的欧洲政治格局几乎是

*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周生升为本文制作了数据图表。

① Maurizio Ferrera,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Golden Achievement, Silver Prospects”,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 Vol. 31, Issue 1-2, 2008, pp. 82-107.

两分天下,虽然在 2005 年的德国议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失去了组阁权,但在整个欧洲,如英国、西班牙、希腊、葡萄牙仍由中左政党执政,至少还显示“粉红欧洲”在欧洲还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

2009 年 10 月希腊主权债务引发的欧债危机,无疑对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影响重大,其中包括对欧洲政党和政治结构的深刻影响,截至 2013 年 4 月,欧洲已经有 8 个国家的政府出现了提前倒台的窘境。欧洲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使得欧洲选民将选票投给了较为保守的党派。2011 年,欧盟 27 国中 19 国(不包括联合政府)的执政党是中右党派。欧洲为什么成为中右政党的大家庭?“经济投票”行为(Economic Voting)能否充分解释欧债危机中的选民投票?本文将结合欧债危机中的欧洲选举结果,从“经济投票”行为对欧洲政党政治结构变迁的影响的角度予以分析和评估。

一 “经济投票”行为理论的研究与解释

早在 1988 年,“经济投票”研究的开创者刘易-贝克(Lewis-Beck)等人就运用理论框架和实证数据比较研究,解释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投票,并对法国政治投票中的经济因素给予了实证分析检验。^①而“经济投票”行为的解释逻辑非常简单,即在市场经济、民主制度下,无论政治认同如何,选民会根据自己的经济感受来选择政治投票,通过选举惩罚经济失败领导者,奖励经济成功领导人。而随后大量的政治学研究者运用“经济投票”行为理论,对西方政党选举展开了各种比较与延伸研究,如博斯(Boix)对于全球化下欧洲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党对待增长与平等战略差异的研究^②,安德森(Anderson)对“经济投票”与政治执政关系的研究,等等。^③这些研究证明和显示了“经济投票”行为在实际选举中的有效性。

并不是所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均同意“经济投票”行为在西方选举中的有效

① 有关“经济投票”的理论研究和分析可参见 M. Lewis-Beck,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The Major Western Democrac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8。而对于法国选举的实证数据检验研究可参见 M. Lewis-Beck and R. Nadeau, “French Electoral Institutions and The Economic Vote”, *Electoral Studies*, Vol. 19, 2000, pp. 171-182。

② C. Boix, *Political Parties, Growth, and Equality. Conservative and Social Democratic Strategies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③ C. Anderson, “Economic Voting and Political Contex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lectoral Studies*, Vol. 19, 2000, pp. 151-170。

性,如1998年斯托克斯(Stokes)就提出了“经济投票”行为的局限性和相对性,并强调公共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选民投票结果,^①而奥德里奇(Aldrich)等人2002年则从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建设对“经济投票”的削弱等角度分析了福利国家对选举的影响。^②而对“经济投票”理论最富挑战性的研究是2008年,也就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欧洲一体化”成就被大加褒扬的时刻,著名政治学家英格尔哈特(Inglehart)在《西欧政治》杂志上,同样通过实证数据比较分析,提出在1970-2006年的欧洲社会变迁中,政治投票行为结果显示,欧洲选民的政治偏好已经呈现从老一代人的“物质主义”向新一代展现个性的“后物质主义”的完美过渡,文化认同差异的价值观变化将主导欧洲政党的投票行为。^③这个结论似乎表明,在欧洲的政党政治选举中,传统的“经济投票”已经不再十分重要,欧洲选民将根据文化认同,而不是物质利益感受来进行政治投票。而在同一期杂志中,另一位著名欧洲政治学者、英国沃瓦克大学教授克劳奇(Crouch)也从历史和社会学视角,解释了1970年代以来的欧洲社会就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移民、宗教等结构性变迁对欧洲政治结构与选举的影响,并承认文化分歧是欧洲选举和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当然克劳奇并不是完全赞同“后物质主义”说法,他使用的就业结构分析视角还是基本支持了“经济投票”行为理论。^④

上述研究视角和结论解释都各有不同,而笔者关心的问题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特别是2010年开始深化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传统的“经济投票”行为理论是否仍然有效?如果有效,那么“经济投票”行为又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影响欧洲政党与政治结构?

二 欧洲债务危机下的“经济投票”行为分析

从支持“经济投票”行为的案例解释来看,在爱尔兰,中右保守党爱尔兰统

① 该研究是对“经济投票”的一个延伸解释,即选民受公共舆论影响对自身的经济状况产生的感受,而不是绝对收入情况,具体研究参见S. Stokes, “Public Opinion and Market Reforms: The Limits of Economic Vot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9, 1996, pp. 499-519.

② J. Aldrich et al., “In Pursuit of the Missing Link: Do Voters Mak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croeconomic Change and Welfare State Growt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2 Annual Meeting of APSA, Boston, MA.

③ Ronland F. Inglehart, “Changing Valu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from 1970 to 2006”,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 Vol. 31, Issue1-2, 2008, pp. 130-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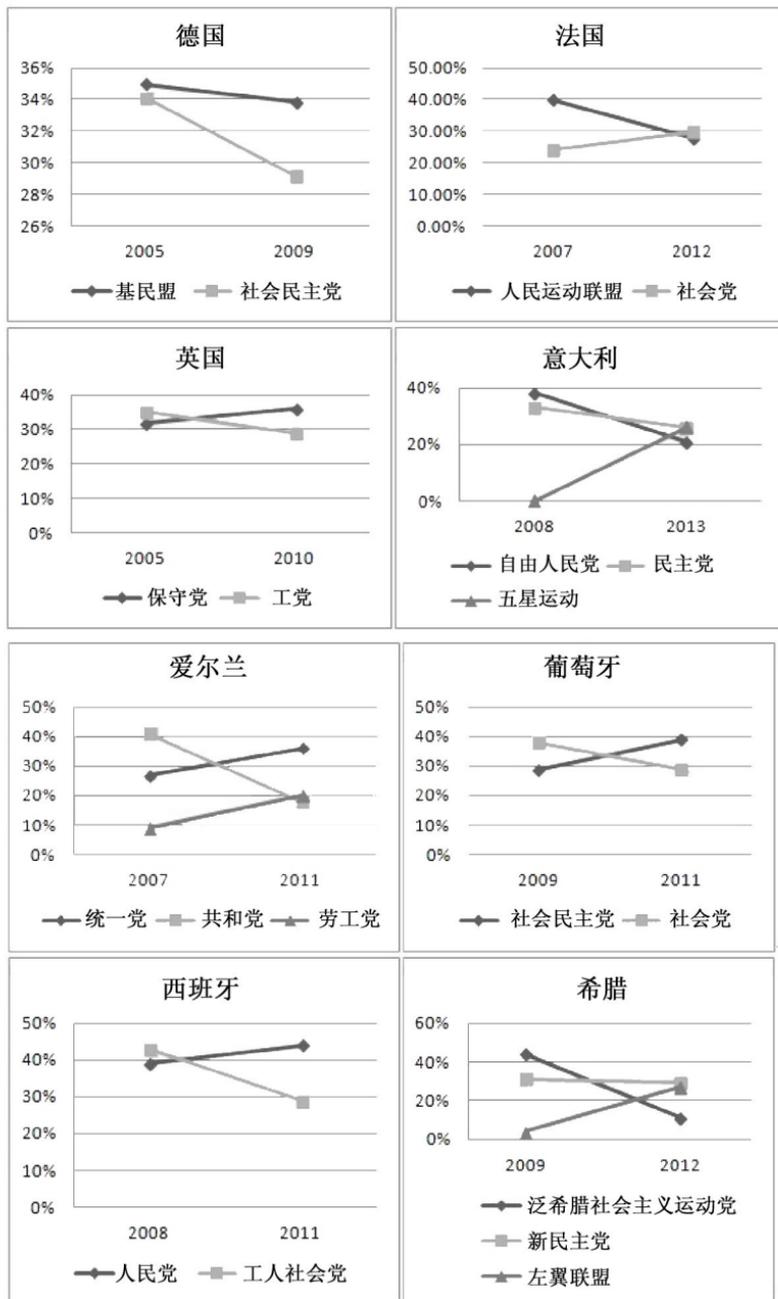
④ C. Crouch, “Change in European Societies Since The 1970s”,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 Vol. 31, Issue1-2, 2008, pp. 14-39.

一党在 2011 年国会大选中获得了 36% 的选票(2007 年是 27%),而从 1932 年以来一直维持最大政党地位的爱尔兰共和党则滑落至第三大党(得票率 17%, 2007 年为 42%);在葡萄牙,中右保守党社会民主党获得了约 39% 的选票,高于 2009 年大选时的 29%,而原最大执政党社会党则从 37% 跌至 28%;希腊的保守政党新民主党同样在 2012 年 6 月份的国会大选中获得了 30% 的选票^①,而原最大左翼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则惨淡收场,最终只获得了 11% 的选票(2009 年大选时为 44%);在西班牙,保守中间派西班牙人民党以 44% 的得票率击败原多数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得票率 29%),而在上一次大选中前者为 39%,后者为 44%。“欧猪四国”的选举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阶段,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不断演化的过程中,选民们的“经济投票”直接影响了欧洲国家的政治选举结果,并改变了政党力量对比。

但是,基于欧洲各国政治结构的复杂性,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政治选举均严格遵循了“经济投票”行为。在基本遵循“经济投票”行为的前提下,还有各种其他因素影响着欧洲的政治选举。例如,荷兰在 2010 年和 2012 年分别因为阿富汗撤军问题和财政赤字问题导致执政内阁倒台,但两次大选中,主要政党包括自由民主人民党(20% 和 27%)、工党(19% 和 25%)、基民盟(13% 和 8%) 与新自由党(15% 和 10%) 得票趋势没有出现较大变化,其中自由民主人民党、基民盟、新自由党都具有中右保守党派意识形态。而意大利情况更为特殊,危机中组建的马里奥·蒙蒂过渡政府结束后,2013 年 2 月举行的议会大选中,意大利中左联盟以微弱优势击败中右联盟,最终以妥协方式组建合作政府,这说明意大利选民对任何派系的政党均不信任。但仔细分析这两个国家的案例,可以发现“经济投票”行为解释仍然令人信服。在荷兰 2012 年大选中,选民已经非常关心赤字问题,并要求负有财政不平衡责任的政府下台;而意大利 2011 年贝卢斯科尼的提前下台,也与意大利受欧债危机影响巨大有直接关系,而蒙蒂的过渡政府应对危机不力,引发民众不满。因此,无论程度如何,如果使用欧洲统计局数据分析,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欧洲大部分国家,无论危机爆发前是中左、还是中右执政,金融危机后,选民还是用“经济投票”直接惩罚了负有经济衰退责任的执政政府。(见图 1)

^① 希腊 2012 年 5 月份已进行过大选,新民主党成为第一大党,但得票率仅为 18%,最后的联合组阁也没有成功。

图1 欧洲部分国家政党支持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European Election Database”数据制作, http://www.nsd.uib.no/european_election_database/。

当然,并不是没有绝对例外,在欧盟新成员国中,由于政治转型中的政党结构不稳定,以及国内政党的分散化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中东欧部分国家并没有完全遵循政治选举中的“经济投票”行为逻辑。如斯洛文尼亚,其2011年失业率7.8%,远远低于当时欧盟国家平均10.9%的失业率,但2011年10月才刚刚成立的斯洛文尼亚积极党,竟然在同年12月议会大选中以领先优势(90席中获得28席)成为第一大党,超越传统大党斯洛文尼亚民主党(90席获得26席),从而改变了该国政治力量对比。同样,斯洛伐克最大政党社会民主-方向党在2010年国民议会选举中虽然获胜,但他们的执政伙伴,人民党-民主斯洛伐克运动、斯洛伐克民族党却未能获得足够席位,而无法联合组阁,结果导致四个反对党,斯洛伐克民主基督教同盟-民主党、自由与团结党、基督教民主运动、桥党筹组新政府。但2011年秋,围绕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扩容问题,右翼执政联盟内部出现分歧,从而导致提前大选,结果社会民主-方向党“咸鱼翻身”。因此,中东欧国家的案例说明,不仅是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国内政党结构不稳定和内部分歧也可能引发执政变化,而这与西欧、南欧国家典型受“经济投票”影响的国内政治结构变化是不同的。

三 “经济投票”行为并未动摇欧洲各国政治结构根基

金融危机背景下,选民“经济投票”行为的结果,往往是选民在赶走执政党时,并非一定选择主流在野党,也有可能选择非主流政党,或者是使原有的政党根基发生动摇,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3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时代曾经出现过,而这次金融危机是否也同样如此?

事实上,欧洲政治根基的传统经过百年的历史波折,特别是在前苏联解体后,目前主要稳定在中左(社会民主党)与中右(基督教自由联盟)两大派系力量的抗衡上。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过程中,如果仅从街头抗议活动和媒体渲染来看,很可能误以为极端主义政治思潮已经占据欧洲社会主流,如同上个世纪193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情况。

但从欧洲选举投票的结果和选民倾向看,尽管金融危机爆发直接影响了欧洲国家政党政府的变迁,恶劣的经济环境也影响着选民的情绪,但从欧洲传统政治根基来看,欧盟15国的选民依旧保持着理性。欧洲中左和中右党派互为竞争对手,但都是传统中间派,其目前依然能够得到70%以上的选票,而典型的极左

翼和极右翼总得票率基本不超过20%，这一趋势在金融危机前后没有特别变化（除奥地利2008年议会大选极右翼得票超过20%）。

具体而言，在爱尔兰2011年大选中，中右派三个政党获得了73%的选票，3个极左政党得票率为12%；在葡萄牙，传统的两大中右和中左政党获得了67%的选票，再加上第三大党中右政党12%的得票率，中间派总得票达到79%，而两个极左翼政党获得了13%的选票；同样在西班牙，传统的两大中间派政党获得了74%的选票；而在英国，传统三大中间派政党瓜分了88%的选票，而2013年未进行大选的德国也同样保持着原有的政治基础力量结构，没有迹象表明，新的极端政党已经利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异军突起。

当然也存在极少数例外。除了上文谈到的斯洛文尼亚特例外，此次金融危机中，在欧盟15国，只有希腊的政党结构受到很大冲击。希腊选民抛弃了主流政党（传统上希腊主流政党是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两党得票率总和往往超过80%，但在2012年6月的大选中，却没有得到半数选票，而希腊极左翼政党——左翼激进联盟以26%的得票率，成为希腊第二大党，首次拥有政府组阁权力。由此，希腊政党体系开始走向分散化，一些从主流政党分离出去的小党也获得了议会席位。^① 相比其他欧洲国家而言，希腊的危机的确非常严重，选民在使用“经济投票”惩罚执政党的同时，已经出现了“政治认同”分散化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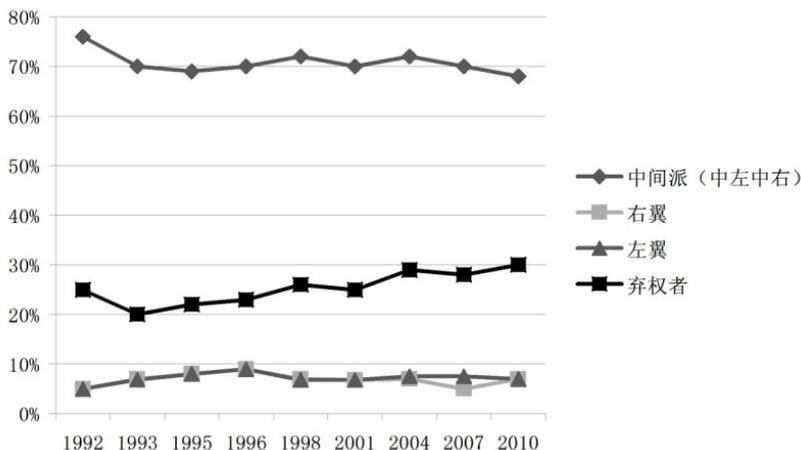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与上个世纪30年代不同，今天的“经济投票”虽然在惩罚欧洲的执政政党，同时也引发了民众需要政治变革的呼声。但目前老欧盟15国中并没有极左和极右党派主导政府的出现。由此可见，虽然遭受金融危机影响，欧洲国家的政局依旧维持在中间派政党的主导态势之下。党派更替和政府提前下台，并没有对欧盟15国（希腊除外）造成政党结构上实质性的冲击，主流政党依旧占据议会多数席位。

这一现象说明，首先，欧洲选民只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而用“经济投票”惩罚当前政府，但在选举投票时依旧考虑的是具有实力的传统中间派政党；其次，极端主义政党，无论是来自极左还是极右的势力，对解决欧洲债务危机根本拿不出有效方案，同时也没有执政经验，选民对他们缺乏普遍的信任；最后，上个世纪魏玛共和

^① 希腊2012年选举后由多个政党组成了议会，具体可参见 http://eed.nsd.uib.no/webview/index.jsp?study=http://129.177.90.166:80/obj/fStudy/ESPA2004_Display&node=0&mode=cube&v=2&cube=http://129.177.90.166:80/obj/fCube/ESPA2004_Display_C1&top=yes。

国崩溃的惨痛教训,也会从历史角度提醒欧洲选民,极端主义不仅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同时还能带来更大的危险。因此,无论舆论如何夸张和媒体如何宣传,实证的数据(图2)显示,金融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仅仅提升了欧洲国家的政治“观望者”,而欧洲政党根基——中左和中右主导局面并没有任何动摇。

图2 欧洲政党政治光谱分布



资料来源: Laura Puglisi, “European Party Landscape in Transition”, *Research Brief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November 14, 2012, <http://www.dbresearch.com/>。

四 “经济投票”行为对欧洲政治结构产生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经济投票”行为没有改变欧洲的政治根基,但并不等于没有改变欧洲的政治生态和选民的政治态度,从欧洲8个国家政府提前下台和法定大选结果,包括欧洲选民态度来看,欧洲政党认同和政治结构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演化中,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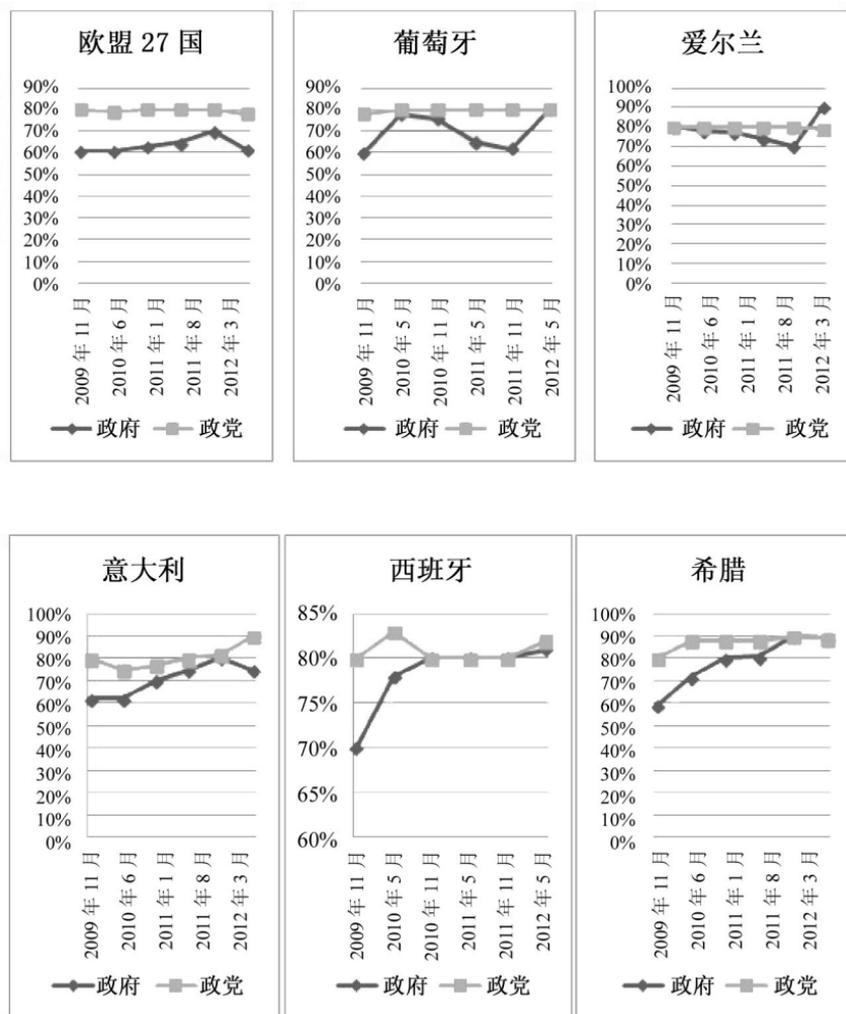
(一) 欧洲选民对政党与政府的信任急剧下降

早在金融危机前,欧洲学术界就在大量地讨论“民主赤字”问题,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是,在欧洲今天的政治生态中,选民既不信任欧盟,也不信任本国政府和政党。^① 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极为需要主权国家政府积极作为

^① 关于欧洲政治是否存在“民主赤字”问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著名政治学者希克斯与欧盟研究专家美国学者莫劳夫奇克对此有精彩的辩论,具体可见希克斯的辩论性文章 http://personal.lse.ac.uk/hix/Working_Papers/Follesdal-Hix-JCMS-2006.pdf。

和民众的信任。然而,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选民对政府和政党的不信任保持了不可思议的高水平(图3),例如,希腊民众对于政府的不

图3 欧洲选民对政府和政党的不信任感



资料来源:根据“Eurobarometer”数据制作,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index_en.htm。

信任感从2009年11月的54%上升到2012年5月的91%,同时对政党的不信任感则平均高达89%,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不信任感也在80%左右。这一数据揭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即在欧洲经济危机深重的国家,一个不受信任的政

府下台后,接替者可能依然是一群不受信任的人,这将大大增加欧洲政治的不稳定性。选民们不信任政党与政府的根本原因还是现实的经济问题。

(二)“经济投票”对欧洲中左翼政党打击很大。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克劳奇(Colin Crouch)教授在金融危机前就注意到欧洲福利国家的危险,并谨慎地认为,欧洲保守主义中右政党政策会赢得欧洲选民的支持。^① 尽管克劳奇当时的论述仅是一项推论,但是欧洲的选举结果却证实了他的推论。1998年9月,欧盟15国中,中左翼(作为主要政党或次要政党)参与政府组成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13个国家,而截至2013年4月意大利组阁结束后,欧盟27国中左政府仅为9个^②,而中左单独执政仅出现在斯洛伐克,在法国是主导执政。虽然,在欧盟27国中,欧洲中左政党在政府中还保持了相当的影响力,但在老欧盟15国,除法国、奥地利外,欧洲中左政党在本次金融危机受到沉重打击。因此,相比新千年伊始,“粉红欧洲”的力量本身由于各种原因已经在欧洲明显衰落(图4),而金融危机则使这种局面更为严重。

导致欧洲中左政党影响力下降的因素是复杂的。如果说英格尔哈特提出的“后物质主义”概念,对于理解今天欧洲中左翼的困境解释是有说服力的,^③而克劳奇提出的就业结构变迁对于欧洲中左翼也是不利的,那么金融危机中,我们又看到了欧洲中左翼政党的哪些弱点呢?

2010年,《西欧政治》以专刊的形式,分专题讨论了欧洲政党竞争过程中社会分歧的现实、文化认同差异、政治精英表现在欧洲选举中对中左翼政党产生的不利结果;^④而2011年来自大洋两岸的美国与欧洲的学者针对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话题,又重点分析了欧洲中左翼政党经济政策的不连贯性、应对市场能

① 参见 Colin Crouch, “Change in European Societies since 1970s”,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 Vol. 31, Issue 1-2, 2008, pp. 14-39. 作为新自由主义辩护者克劳奇教授在金融危机后的2011年又发表文章讨论“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在欧洲不会死亡,具体文章参见 http://www.management-revue.org/papers/mrev_1_12_Crouch_Review.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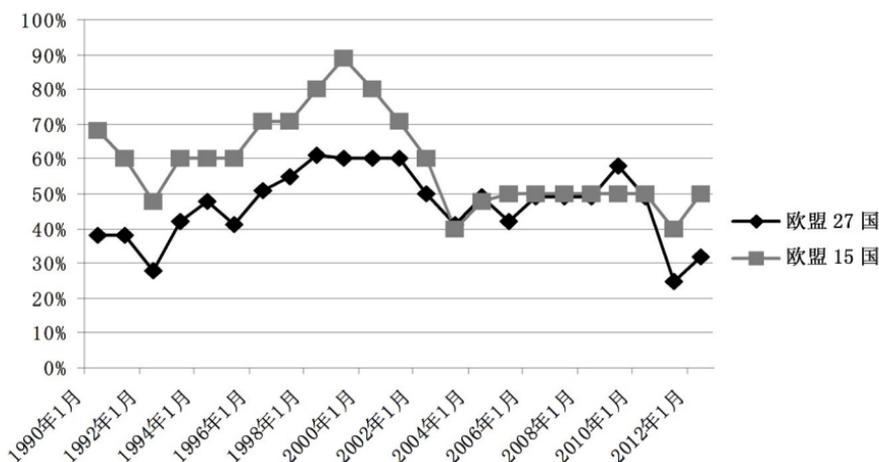
② 意大利在2013年大选后,中左联盟虽然获胜,但组阁要求遭到第三政党五星运动拒绝,经过反复磋商,最后以微弱优势妥协方式组成联合政府,但中右翼政党人士获得了政府内重要部门的任命,包括副总理人选。

③ Roland Inglehart, “Changing Valu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from 1970 to 2006”,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1, Issue 1-2, 2008.

④ Zsolt Enyedi,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Wester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Special Issue, Vol. 33, 2010.

力薄弱等核心缺陷对选举带来的负面影响,①这些研究的视角和结论都比较接近“经济投票”的理论解释。

图4 中左翼政党参与政府组成数量(百分比)



资料来源: http://www.fes.de/ipa/inhalt/monitor_en.php。

当然乐观的分析也存在,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国际政治分析处处长恩斯特·海勒布兰德博士在其研究中,对比分析了1990年代末到2012年的欧盟国家政党结构分布,并承认欧洲中左翼的衰落是一个长期的现实。②但他认为,欧洲中左翼政党自2000年以来,虽然在政治行动上的诸多失败导致了今天的消极认同,但金融危机使得欧洲民众对于放松市场管制、新自由市场经济主张感到失望,而欧洲中右保守党往往同这些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反而给了中左翼一个重新崛起的机会。当然面对目前欧洲的政治现实,他也坦承:“这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时段,社会民主主义虽然远不及二十世纪下半叶时那样强大,但它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更加积极的领导下,凭借新的旨在重新联合工人阶级选民的政策建议,以及反映强烈个人主义社会关注和利益的政治策略,这些党

① James Cronin and George Ross eds., *What's Left of the Left: Democrats and Social Democrats in Challenging Tim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德]恩斯特·海勒布兰德:“欧洲中左翼现状”,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简报,2012年12月第17期。

派甚至可能重新变成这个时代的政治领导力量”。^①

同样来自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的韦塞尔斯(Bernhard Wessels)博士则从选举的角度,对后金融危机形势下欧洲政党结构变迁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论述。^②他在研究中指出,政党在选举中的失败/成功因素是复杂的,但有些因素在某些时候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即选民在投票时会惩罚表现不佳的执政党。那么决定政府表现不佳的因素又是什么呢?韦瑟尔斯对欧洲中左、中右两大派系选民进行调查后发现,虽然左右政党派系选民在福利和教育方面的意见有区别,但双方对政府的经济诉求都非常高,且远高于福利和教育指标(图5)。

图5 欧洲左右两派选民意向

对于政府改善哪个方面的政策最容易感到满足		
	社会民主党派选民	保守党派选民
健康保障体系	1.4	2.0
教育体系	1.2	0.6
经济状况	5.1	4.5

资料来源:Bernhard Wessels,“The Voter’s Choosy Heart Beats Left of Centre, Satisf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Attitudes of Social Democratic Voters in European Comparison, 2002–2008”,Friedrich–Ebert–Stiftung, May 2012, http://www.fes-globalization.org/dog_publications/global_governance.htm。

同样,德国银行集团研究所的学者普吉立斯(Laura Puglisi)在研究后金融危机时代欧洲政党变迁时,也采用了“经济投票”行为来解释欧盟国家政党与政治结构的变化,她认为,“经济投票”行为的解释尤其适用于金融危机时刻所发生的政党变迁,在“经济投票”行为驱使下,经济表现在国家大选中成为重要砝码,选民投票之前,他们会观察劳工市场、通胀、总体GDP和个人收入情况来评估政府的经济政策,由此会产生一种奖惩假设(reward–punishment hypothesis),即无论选民意识形态如何,只要经济衰退,政府就会在投票箱受到惩罚。简而言

① [德]恩斯特·海勒布兰德:“欧洲中左翼现状”。

② Bernhard Wessels,“The Voter’s Choosy Heart Beats Left of Centre, Satisf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Attitudes of Social Democratic Voters in European Comparison, 2002–2008”,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May 2012, http://www.fes-globalization.org/dog_publications/global_governance.htm

之,如果经济表现逊色,那么执政政党得票率下降甚至下台。金融危机中的欧洲国家政治选举似乎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而从历史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下中右翼政党会占据投票的优势。^①

对于上述解释,最能验证的案例是希腊。希腊的经济结构问题,早在中右政党新民主党执政的2004-2009年期间就已出现,可以说新民主党对希腊经济衰退和引发债务危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悖论是,在2012年提前大选中,2009年成为执政党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却在投票箱前遭到惩罚,得票率不到11%,而“祸首”希腊新民主党居然获得了30%的选票。这说明,选民是健忘的,他们只能用“经济投票”惩罚现任执政政府,而不追究经济崩溃的原因。这样的例子也发生在2011年西班牙大选,执政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失去了15%左右的选票,而让位于中右翼的西班牙人民党。^②

当然,“经济投票”并不是完全不利于欧洲中左翼,法国就是个例外。由于选民在选举中用“经济投票”惩罚执政党时并不区分政党本身的政策导向,而仅在于选举时,谁在执政。因此,2012年法国大选中,即使在整体欧洲中右翼政党选举大获全胜的背景下,2002年和2007年两次大选都获胜的法国中右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却败给了中左翼的法国社会党。虽然这次大选国内情况十分复杂,但其核心问题还是“经济安全”。面对本国超过10%的失业率和德国不到6%的失业率反差,法国选民根本不在乎中右翼执政党在全欧洲的胜利,也不在乎当时法国总统萨科齐为欧债危机解决进行的有效努力,更不在意当时为人称道的“默克尔-萨科齐”联盟对欧洲政治稳定的作用,甚至也没有仔细考虑过,法国社会党的经济政策是否有利于经济恢复和欧债危机解决。因此,“经济投票”惩罚,具有强烈的时效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特定前提下,似乎缺少政党意识形态和理性分析成分。^③

(三)“经济投票”有利于欧洲极右政党力量的加强

2010年9月,德国最大的主流报纸《明镜报》刊登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

① Laura Puglisi, “European Party Landscape in Transition”.

② 有关西班牙2011年大选的研究,参见 Paul Kennedy, “From Unpopular Socialists to the Popular Party: The Spanish General Election of 2011”,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5, No. 3, 2012, pp. 673-681.

③ 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投票符合“经济投票”理论解释,在民调中显示93%的穆斯林选民会投社会党奥朗德,而79%的天主教选民会投萨科齐,穆斯林选民目的是保护自己的经济安全,是因为法国社会党对移民和居留持宽容态度,而部分天主教选民同样认为是移民剥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这种表面的宗教分歧对应的是经济安全本身,而不是传统的政党意识形态。有关大选前民调分析可参见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muslims-hollande-france-sarkozy-2012-5>.

列举了当时在欧洲各国议会中存在的极右势力,宣称右翼民粹势力正在获得欧洲的广泛民意,并将使欧洲主流政党右倾化。^① 根据《明镜报》的分析,在整个欧洲,以极右党派在议会中所占议席的比例来看,分别是:瑞典民主党 5.7%,挪威进步党 22.9%,芬兰真正芬兰人 4.1%,拉脱维亚祖国与自由党 5.0%,爱沙尼亚秩序与公正党 12.7%,比利时佛拉芒利益 7.8%,奥地利自由党 17.5%,奥地利未来联盟 9.2%,斯洛伐克民族党 5.1%,斯洛文尼亚民族党 5.4%,匈牙利杰布科 12.2%,保加利亚阿塔卡 10.1%,希腊泛东正教 5.6%,丹麦人民党 13.9%,瑞士人民党 31%,意大利北方联盟 8.3%,荷兰自由党 15.5%,其中瑞士人民党和意大利北方联盟已参与政府组阁,而情况比较特殊的是法国,虽然法国极右的人民阵线在法国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其领袖勒庞曾有机会问鼎法国总统的位置,但其在议会中却无席位。^②

对于金融危机在欧洲政党结构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欧洲最为担心的是右翼民粹政党和极端右翼政党的崛起。^③ 两位年青的德国学者诺拉·巴切尔龙(Nora Langenbacher)与布莱塔·施伦堡(Britta Schellenberg)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利用全欧洲研究网络对西欧、东欧、北欧的极右政党组成和政治动员结构分析后指出,极右政党共同特点是利用三个因素推动自身发展,分别是社会问题、抨击政治腐败、传播民族认同,^④而金融危机不仅催生,同时还膨胀了这三个因素的发展。还有学者如迪米特里·阿尔梅达(Dimitri Almeida)更敏锐地关注到“欧洲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的问题也是欧洲极右政党和政治势力的催生因素。^⑤

从社会问题上看,欧盟 27 国年轻人(15-24 岁)失业率从 2008 年的 15.8% 上升到 2011 年的 22.8%,深受债务问题困扰的南欧国家,2012 年年轻人平均失业率更是高达 42.4%。现实社会问题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抗议政府的

① “Continent of Fear: The Rise of Europe’s Right-Wing Populists”, Spiegel Online, September 28, 2010,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continent-of-fear-the-rise-of-europe-s-right-wing-populists-a-719-842.html>.

② Ib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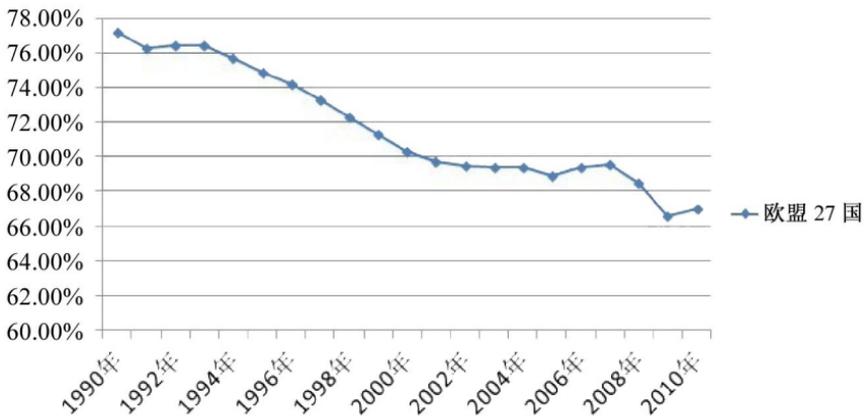
③ 目前学术界尚未准确区分右翼民粹和极端右翼,故本文笼统归入极右政党。他们共有的特征是具有排外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性质,极端右翼往往被指在行为上过激。

④ Nora Langenbacher and Britta Schellenberg, “Introduction: An Anthology about the Manifesta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adical Right in Europe”, in Nora Langenbacher and Britta Schellenberg eds., *Is Europe on the “Right” Path? Right-wing Extremism and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11.

⑤ Dimitri Almeida, “Europeanized Eurosceptics? Radical Right Parti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1, Issue 3, 2010.

活动,而年轻人冲动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阅历的缺乏往往对于政治稳定形成潜在的威胁。实证研究表明,15-24岁的年龄层选民们更倾向于投票给民粹主义政党。^①从政治衰败角度来看,不仅是贪污和政府任职官员的裙带问题,其更直接体现在欧洲政党本身能力的退化和政党认同的急剧下降。正如比耶赞(Ingrid Van Biezen)、梅尔(Peter Mair)和波古恩特克(Thomas Poguntke)三位学者的研究所显示的,1980年代到2008年欧洲政党党员参与选举的变化表明,如今欧盟27国选民中各党党员的参选数量从早年的10%以上大幅跌落到如今约4.65%,^②同时欧洲普遍政治投票率都比较低(十年下降10个百分点),表明欧洲政党正在失去广泛的代表性(图6)。从传播民族认同角度看,根据“欧洲晴雨表”历史调查显示,金融危机后欧盟公民对于欧盟的信任感,被不信任感大幅超越(转折点为2010年),并且差距逐渐增大,这对于以“欧洲怀疑论、反欧洲统一、反精英”为意识形态的极右政党来说显然是个好消息(图7)。

图6 欧盟27国选举平均投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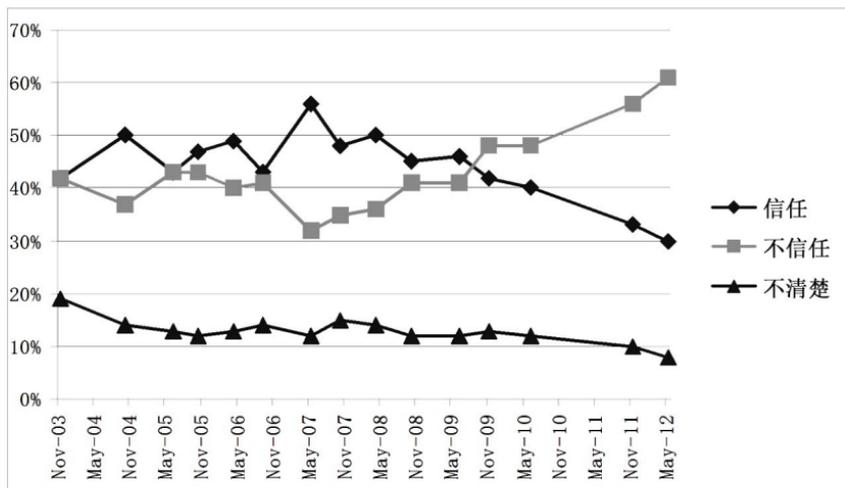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Eurostat”,<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eurostat/home/>。

① Laura Puglisi, “European Party Landscape in Transition”.

② Ingrid Van Biezen, Peter Mair and Thomas Poguntke, “Going, Going, . . . Gone? The Decline of Party Membership in Contemporary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51, Issue 1, 2012, pp. 24-56.

图7 欧洲民众对欧盟的信任感



资料来源:根据“Eurobarometer”数据制作。

对于欧洲极右政党的支持和得票率已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如男性、青年人、中低受教育程度,包括特定的社会阶层等投票者比较倾向于支持极右政党,^①同时研究还显示,宗教信仰对极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影响也很大。^②那么“经济投票”对极右政党影响又是如何呢?

根据德国学者普吉立斯的研究,就历史实证数据而言,欧盟国家极右政党的崛起与社会失业率有着明显的正比例关系,经济情况恶劣,失业率越高,极右政党的得票率也就越高,反之亦然。^③不过,在受欧债危机影响深重的国家中,除了希腊、意大利以外,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的议会选举中并没有发现极右力量的膨胀。^④事实上,相比1990年代末,欧洲极右势力在没有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得票率要高于现在。由此可见,欧洲极右政党在金融危机后的抬头,可能更多的是社会经济环境互动的一个长期结果,并非单纯是金融危机造成的政治格局的

① Marcel Lubbers, Me'rove Gijsberts and Peer Scheepers, “Extreme Right-Wing Voting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1, No. 3, 2002, pp. 345-378.

② Kai Arzheimer and Elisabeth Carter, “Christian Religiosity and Voting for West European Radical Right Partie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2, No. 5, 2009, pp. 985-1011.

③ Laura Puglisi, “European Party Landscape in Transition”.

④ 极端政党与各国传统政治历史结构有极大关系,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在传统上就有极强的左翼势力,而金融危机则是凸显了这些国家极左翼力量的上升,其实就是一个对经济现状不满的另一个方向的极端性反射。

根本改变,金融危机中的“经济投票”仅是发挥了推动性作用。

对此,长期研究欧洲极右政党的荷兰学者穆德(Cas Mudde)整理分析了30年来欧洲17国(欧盟15国、挪威、瑞士)极右政治势力影响,并结合其在金融危机后的选举表现后认为,虽然金融危机下的“经济投票”结果,使得欧洲政坛极右翼崛起,但就总体而言,欧洲还没有到谈“右”色变的程度。^①首先从得票率来看,尽管有一些极右政党得票率令人震惊,但还达不到所谓“欧洲极右浪潮”的地步,因为在欧盟17国议会中只有一半议会存在极右政党;其次从国别情况来看,2008年以后进入到欧洲17国政府的极右政党分别是丹麦的人民党、希腊的人民东正教阵线、意大利的北部同盟、荷兰的自由党、瑞士的人民党。但这些政党成功有其特殊背景。

具体而言,丹麦、荷兰、瑞士传统上是少数派政府,极右政党势力不仅有深厚的根基,同时移民带来的问题还常常困扰着执政政府,许多民众倾向于支持右翼呼声;希腊的人民东正教党之所以能进入内阁,原因是2011年金融危机导致总理帕潘德里欧下台,议会不得不组建过渡性临时政府。而意大利的情况更为复杂,意大利的北部联盟虽然属于极右政党,但却作为意大利主流政党自由人民党的选举伙伴,往往被归入到中右联盟,其在2013年大选中只拿到了4.1%的选票,低于2008年的8.3%。同时,芬兰、比利时、挪威虽然极右政党得票率高,但从来被中左中右两大势力接纳而进入政府;而奥地利最大极右政党自由党票数确实得到增加,但没有达到历史最高值,奥地利政权依旧掌握在传统的两大政党社民党和人民党手中。当然,就中东欧国家而言,政治态势不稳定和转型中的困惑,是中东欧国家存在极右政党的根本原因,但总体而言,中东欧极右政党势力仍然是在一个可容忍范围内活动。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从欧洲政党结构变迁历史而言,与二战前的欧洲社会民主党、1990年代的绿党一样,基于历史环境的变化,欧洲极右政党很可能从一个激进的反对派变成政府的得力助手,因为已有研究显示,欧洲一些主流政党已经在和极右政党开展一些社会文化方面的合作,金融危机后更是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相互妥协。^②

根据历史经验,如果欧洲的失业率能够重新回到正常水平,那么欧洲极右政

^① Cas Mudde, “Three Decades of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So Wha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52, Issue 1, 2013, pp. 1-19.

^② 对于极右政党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和社会政策党派妥协方面的研究可参见 Tjitske Akkerman, “Comparing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Government Im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Politics in Nine Countries (1996-2010)”,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5, No. 3, 2012, pp. 511-529.

党的政治影响力可能出现下降,但这并不绝对,我们不能忽视目前欧洲复杂的社会问题导致的极右势力抬头所隐藏的危险性和影响力。在这一点上,“经济投票”只是增强了欧洲极右势力,而欧洲极右的本质问题,可能更符合英格尔哈特的“文化认同”理论的解释。

结 论

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西欧政治》用特刊的形式综合了欧洲8位著名政治学者的研究,他们分别从政治选举中的阶级分歧、意识形态分歧、社会分歧、经济结构分歧、地区分歧等多个角度对欧洲政党竞争进行了研究,^①虽然这些研究还是沿用了1967年李普赛特-罗坎经典的分析视角。^②但是,从社会经济分歧结构角度看,特别是在欧债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经济投票”还是非常直接、明显地影响了选民对于政党的选择。因为,无论是传统中左与中右选民均非常在意自身实际的经济感受,而极右政治势力也充分利用了“经济投票”结果而崛起。其导致的可能结果是,由于欧洲中左政党政策应对经济能力弱,其政党理念如福利保障等也不利于欧债危机的解决。^③因此,欧洲中间派选民,即使不支持极右政党的排外诉求,也会偏向于欧洲中右政党,而这也长期影响着欧洲的政党与政治力量。

但是,与理论逻辑推演完全相反的是,与美国不同,欧洲选民没有用“经济投票”惩罚对金融危机负有主要责任、主张“放任自由”市场的欧洲中右政党(法国或许是个例外)。相反,欧洲选民显得惊人的“经济理性”,在忍受大规模财政收缩导致的福利削减和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他们似乎更有信心认为,只有中右政党的福利削减与市场化改革,才是拯救欧洲债务危机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氛围

①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Wester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Special Issue, Vol. 33, 2010.

② S. M. Lipset and S. Rokkns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p. 13-16.

③ 理论上,欧洲中左政党以“凯恩斯主义”为政策指导,以负债为福利开支基础,这已经引发欧洲债务解决难题的争论。以法国为例,2012年社会党奥朗德上台后,并未提出有效的解决欧债危机的对策,其国内提高征税引发了大规模资本外逃,法国疲弱的经济已经远落后于德国,最新民调显示,奥朗德支持率急速下降。

下,欧洲中左和极左政党似乎面临了新的困境。^①

与欧洲中左政党命运不同的是,欧洲极左政党也因经济危机的出现而获得了一部分支持,但并不十分显著。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党是斯洛伐克的极左翼政党——普通人与独立人格党,在2012年大选中获得了8.6%的选票,这是该党第一次参与大选,但这仅是中东欧国家的少数例子。大部分欧盟国家的选举得票结果是,极左翼政党远不如极右翼政党势力强大。

分析欧洲极左政党没有利用金融危机崛起的原因。两位持续研究欧洲极左政党的学者鲍耶尔(Benjamin Bowyer)和韦尔(Mark Vail)运用了德国的案例研究,解释了极左政党目前在欧洲普遍面临困难的原因。两位学者认为,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分配政策本身,在影响着部分选民对欧洲极左政党的支持,这也是对“经济投票”的一种间接性解释。就分配政策本身而言,事实上,欧洲中右与中左政党也均通过“社会欧洲”战略再调整,来解决经济不安全问题,这样,欧洲极左政党在狭缝中很难寻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②另外,研究还显示,欧洲极左政党目前是极度分裂的,他们并不能在欧洲层面形成一个统一的政策主张,更没有共同的政党认同。^③

比较值得观察的是2013年9月,德国和奥地利将迎来大选。对欧盟国家政治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德国来说,目前默克尔领衔的中右党团依旧占有绝对的优势,2013年4月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德国选民支持中左翼比例仅有27%,支持中右翼党团的比例为63%^④,德国2013年9月大选似乎已经没有悬念。分析德国案例,可以认为,金融危机使得选民在政治投票中更为“经济理性”。金融危机中,德国、荷兰、瑞士等国良好的经济表现,使得欧洲选民更加认为,只有在欧洲中右政党主导下,欧洲才能克服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解决危机不仅需要务实的经济政策,同时还需要领袖级政治家,而对于今天的欧洲而言,在

① 欧债危机救援中的“三驾马车”与资金提供国德国、荷兰均认为高福利的南欧国家必须削减政府支出,而法国提出的“开支刺激经济”方案根本没有得到呼应,显示了德国中右政党政策在欧洲政治中的强势话语权。

② Benjamin Bowyer and Mark Vail, “Economic Insecurity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and Support for the German Left”,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4. No. 4, 2011, pp. 683-705.

③ 如法国、意大利等极左政党参与政府,西班牙、瑞典支持执政政府,德国、荷兰极左政党反对政府,说明欧洲极左力量极度分裂。有关欧洲极左政党对于政府参与的研究可参见 Jonathan Olson et al. eds., *Left Parties in National Governments*, Palgrave, 2010.

④ [Http://www.dbresearch.com/servlet/reweb2.ReWEB?addmenu=false&document=PROD0000000000304231&rdShowArchivedDocus=true&rwnode=DBR_INTERNET_EN-PROD\\$NAVIGATION&rwobj=ReDisplay.Start.class&rwsite=DBR_INTERNET_EN-PROD](http://www.dbresearch.com/servlet/reweb2.ReWEB?addmenu=false&document=PROD0000000000304231&rdShowArchivedDocus=true&rwnode=DBR_INTERNET_EN-PROD$NAVIGATION&rwobj=ReDisplay.Start.class&rwsite=DBR_INTERNET_EN-PROD).

欧洲中左党派中,显然已经没有十年以前布莱尔、施罗德那样的重量级政治人物了。

因此,当“经济投票”主导欧洲政治选举投票,而欧洲选民“经济理性”在影响其政治认同的环境下,后金融危机时代欧洲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即欧洲政党如何面对政党能力、党员忠诚、选民流失、投票率下降等等传统的政党议题?

事实上,当更多的老一代欧洲选民在回忆撒切尔、布莱尔、希拉克、科尔、施罗德等 20 世纪富有感召力的政治人物,并回味的欧洲一体化黄金十年的成就,而新一代年青选民既不知政治为何物,也不知政治能够为自己带来什么,同时在踏上社会就面临失业和痛苦的生活状态时,当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谓的“人类代际间合伙关系”就被彻底破坏了。^①这不仅会毁害欧洲百年历史演化而形成的政党认同和选民价值观基础,而且会割裂新一代选民与老一代选民的政治联系。同时就更深层次的问题来看,欧洲现代民主政治的根基是“公民社会”,而当今欧洲,特别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党政治的博弈核心是应对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和经济的复苏,而利益诉求分歧巨大的欧洲“公民社会”既不能为快速解决经济问题,提供有建设性价值的解决方案,同时具有欧洲传统“公民社会”特征的国家,也更趋于保守和排外,而且分裂化。^②这对于得到“经济投票”奖赏,而“悬孤”于权力之巅的欧洲政党而言,其社会根基缺乏、党员忠诚下降、选民远离政治等问题,将持续威胁欧洲今天主流政党执政的内在合法性。而这个问题,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欧洲政坛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和难以解决的问题。

(作者简介: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格森结合金融危机讨论了西方社会严重的制度性缺陷,特别是代际政治认同差异与经济鸿沟问题,具体论述可参见[英]尼尔·弗格森:《西方的衰落》,米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24 页。

^② 所谓“分裂化”是指南欧和北欧国家之间的断裂,同时也是欧洲日耳曼语系与拉丁语系国家的断裂,其不仅典型体现在比利时政治结构南北对立的特殊性上,同时北欧普遍的极右政治势力上升也威胁着欧洲一体化中的传统政治认同。